

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論文集

黔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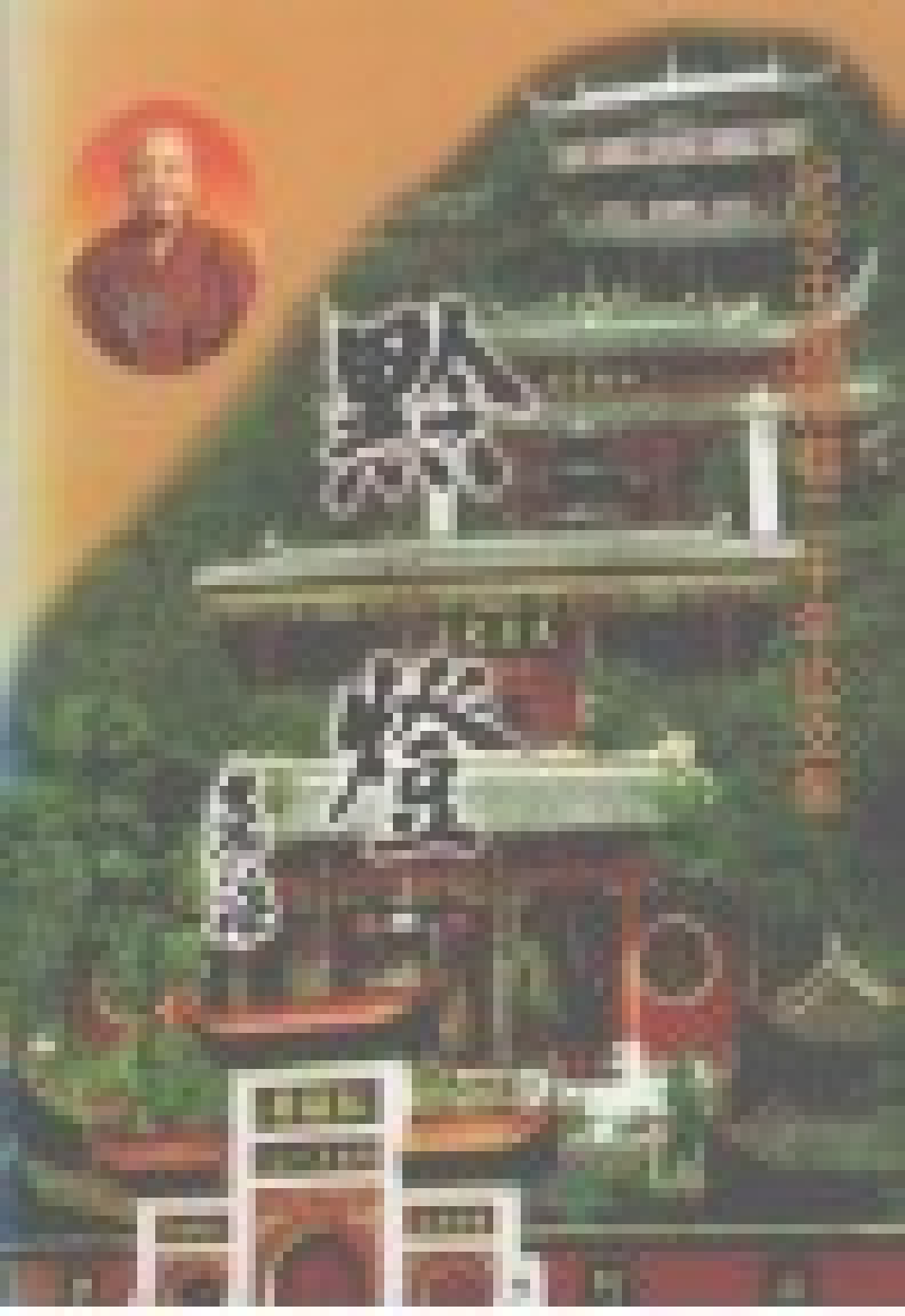
慧海



彌

阿

無



B94-53

10
1

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論文集

貴州省佛教協會合編
貴陽弘福寺《黔靈叢書》編委會

准印证:黔新出(99)内资准字第 244 号

黔 灯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论文集

贵州省佛教协会合编
贵阳弘福寺《黔灵丛书》编委会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189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出版日期:1999 年 6 月 处理:交流与赠阅

承印单位:贵州省科技信息开发中心印刷厂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定价 21.00 元

前 言

“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

时间上没有始终，空间上没有内外，时与空浑然一体、包罗万象，这就是宇宙。——这就是佛法的宇宙观。

在无边无际的虚空法界当中，个体的生命，显得多么渺小！

在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河当中，每个生命由生到灭的“现象阶段”，显得多么短暂！

我们作为“渺小者”，就在这“短暂”当中懵懵懂懂地活着！

于是，我们想壮大生命的价值，想追求生命的永恒，我们真的想达到“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这，并不难！

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根本导师——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点亮了宇宙间亘古不灭的慧灯，燃起了众生心中永不息灭的圣火，开启了天地间第一神圣的智慧之门！

于是，人世间有了佛法！佛法，就是能令我们达到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的唯一无上法门！

二千年前，佛法从她的发祥地印度，迈著大雄大力的步伐，来到了中国。中国，乃天然的“大乘佛法之摇篮”！

到今天，佛法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二千年的风雨历程！

二千年，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一个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数字！

如今，当我们站在这千载一时的历史聚焦点上，作为一位身心都受到佛法无上智慧甘露洗礼的佛子，我心潮澎湃，欲言又无言。因为此时此刻，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显得那么暗淡和苍白，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语句，来表达这一份无尽的敬意！

《法华经》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以散乱之心称扬圣号，尚且如此功不可磨。圣典的开示和印可，促使我们自信、自立、自强而又自豪！

我们要以凡夫俗子最虔敬的心情和最笨拙的语言，来记住这历史的一刻！

时间，定格在西元 1998 年。

贵阳黔灵山弘福寺，在方丈慧海老法师的倡导下，由贵州省佛教界、文化界的英彦贤达们踊跃参与，真可谓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汇集成了这一本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专辑小册子。当此册付梓之际，我还在想：古人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们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其意义也如此。其它所谓的文笔、章句、词藻、格调等等，都应该不那么十分要紧，只要有这一份积极参与的心情，就已经足够了！您说是吗！

1999 年春节 释崇慈谨识

目 录

前 言	释崇慈(1)
-----	--------

回顾千载 展望百年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

..... 《法音》、《佛教文化》联合社论	(1)
-----------------------	-----

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感言	释宗满(15)
---------------	---------

漫谈佛教的“极端主义”

——“中国佛教二千年”感言	释崇慈(17)
---------------	---------

佛教佛学的中国化现代化	陈福桐(27)
-------------	---------

般若智慧与禅道治疗学	张新民(36)
------------	---------

佛教对我国中古文学的重大贡献

——兼论杜甫的“见道之作”	田光烈(57)
---------------	---------

唐代禅宗与近古思想解放潮流	吴雁南(100)
---------------	----------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史继忠(112)
------------	----------

佛教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纳光舜(152)
------------	----------

从惜缘到观照佛学与现代人生	王华中(164)
---------------	----------

佛学思想对维新志士的影响	李双璧(174)
佛教与贵州文学	黄万机(193)
建文帝与贵州佛教	王路平(207)
适应时代发展、创新佛学研究的杨文会 ...	刘泳唐(224)
太虚大师与贵州佛教	王路平(235)
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	
——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	
.....	张新民(257)
贵阳佛教人物絮话	释宗满(282)
梵净山佛教考	张 明(292)
必须重视宗教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	林建曾(305)
倡导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释宗满(313)
简述宗教的影响与作用	于民雄(317)
后 记	释崇慈(326)

回顾千载 展望百年

——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

1998 年是中国佛教二千年。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是目前见诸正史明确记载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原文见《三国志》裴松注所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其后 60 余年,汉明帝“永平求法”,将佛教初传推向新阶段。经赵朴初会长和 1998 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的历史标志,在 1998 年度举办“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经研究并报请中央领导同志批准,1998 年 5 月 8 日,以国宗函[1998]097 号文件发出《关于举办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活动的批复》。

依照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名誉会长赵朴初先生的批示,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的活动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中国宗教学会协办。这是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联袂共办普天同庆的一件大事。

回顾千载,展望百年,使我们在中国佛教迈向新的千年、新的世纪的里程时,站在历史的门槛前感慨不已,思绪万千,壮志勃发。

二千年,中国佛教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度辉煌。

二千年前的今日,一位来自北天竺的和平使者,一位虔心佛法的忠实教徒,开始把佛陀的遗教注入中华文化的洪流。佛教的传入,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下和平往来、平等交流的范例。作为已经在古印度北部建立国家而且举国信仰佛教的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成为第一个列入中国史册的佛教弘法人。他的努力得到汉王朝的理解。在王朝中具有相当官方地位的博士弟子景卢能够被允许跟随他学习《浮屠经》,表明了汉王朝政府的开放态度。虽然这一历史的瞬间在史书中的记载只有短短的几行,但是这几行字所传达的信息,却足以使我们了解到佛教初传时在古长安发生的那一幕其乐融融的情景。

“伊存授经”之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走入上层。67年之后,即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奉帛愆罪”,得到汉明帝“诏书还赎”,其中对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加以肯定,并将黄缣白纨三十匹还给楚王,“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饌”。此处清楚地表明,当时在楚王的治下,已出现皈依佛门的出家众和在家众。对他们的称谓,也与伊存所授

《浮屠经》中列举的基本一致。因此,赵朴初会长曾赋诗指出:“四海颂一马,千秋护两坟。若教耨机在,应记楚桑门。”

世传明帝“永平求法”,表现出中国政府的明确的官方态度。从“伊存授经”到“永平求法”,一授一求,恰好构成初传时期的第一轮重要往来。其后千余年间,这种授求关系不断推动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着中国佛教不仅发展了汉语系,而且发展了藏语系和巴利语系,形成了三大语系俱足、三乘同步的盛大局面。同样,在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也出现了这种授求关系,对于中国佛教传向亚洲各国并在各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起到了和平推进的作用。

回顾中国佛教的历史,很有必要的是重新审视对中国佛教历史阶段的划分。划分历史时期,具有宏观把握的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先要提出两个划分的前提。

一、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是站在历史发展的终端,而是处于历史仍在运行之中的某一点上,特别是对宗教(包括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更要明确这一观念。如果认为在中国社会已存在数千年的有据可考的宗教(其中佛教为二千年)基本都已衰微,即将泯灭,那么必然要划出一条从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曲线,并以当今作为结论的时刻。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和可能。

二、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包含了人类社会几乎全部的存在因素。从哲学、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的角度去判断宗教的兴衰都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全方位的观察、多层次的阐述和大系统的论证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

基于这两个前提,我们可以对中国佛教提出这样两个重要判断:

一、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并不像某些观点描述的那样,呈一个倒锅形,把唐代佛教置于锅底最高点,然后便一直走下坡路。中国佛教的发展是阶梯式的。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地发展,佛教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充实着自己,并以自己的根本言教去度化世间。如果说人类社会的总趋势是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高,那么佛教也必然是如此。只要能适应时代的转变并保持自身的根本,中国佛教就必然会踏上更高的阶段。

二、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佛教最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自从传入中国之始,佛教便与中国的固有文化在碰撞中走向融合。我们所说的中国佛教,是包含经学、哲学、艺术、文化、真谛信仰和俗谛信仰在内的综合体。所谓中国佛教的兴衰发展阶段,也是就这个综合体的整体而言,并不能以其中某一因素的增减强弱而断言整体的趋向。那种以哲学范畴为唯一尺度,认定中国佛教以唐

代为顶峰的观点,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在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让我们且以千年为周期做一次回顾。

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在这一千年中,佛教用了582年的岁月度过早期的“译传阶段”,从与中国思想和现实的简单生硬结合,转向以追本溯源为目的的大规模翻译与专题研究。而这种追本溯源,非但没有解决一些人所发现的译文不准确的问题,反倒促进了具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更成熟的佛教不断成长。在这一阶段里,道安、慧远等高僧既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处世立场。

中国佛教583年之际,隋朝建立。其后325年,便是号称鼎盛的隋唐佛教时期,特点是在译传阶段的基础之上,从智顗大师开创天台宗为始,不同的派别都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作为立宗、判教的依据,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慧能大师予以弘扬光大的禅宗,举世公认最具中国特色。中国佛教各宗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可称为“创造阶段”。在唐代“三教鼎立”的背景下,这里所说的协调性,当时还是侧重于佛教内部各种流派的协调,而与中国固有思想的协调则未得到突出,于是出现佛教与儒道对峙有余却相融不足的局面。“三武一宗”灭佛,虽有多种因素,但这个大背景实在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佛教5世纪前后,现在盛行巴利语系佛教的东、泰、缅诸国,已经与中国交往频繁。7世纪中叶至9世纪的上半叶,藏传佛教度过了约200年的前弘期。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俱足的格局,在第一个千年的后半轮和第二个千年之初,已逐渐形成。

在第一个千年的最后一个世纪的60年代之前,中国佛教经历了极其黑暗的一段遭遇。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除禅宗之外,佛教各宗都出现了暂时的衰败。其中如天台宗、法相宗,竟连主要的经典都已失传。

宋王朝的建立,将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重新推向高潮。复兴的宋代佛教在规模、人数等方面很快便胜过了前朝。仅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僧人总数已达39.7615万人,尼6.1240万人,大大超过了唐武宗毁佛时强迫天下僧尼还俗的总数26.05万人。各种主要的宗派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这种趋势随着封建社会向其最高阶段的推进而逐渐加强。

中国佛教的第二个千年是以宋真宗亲制《崇释论》宣告开始的。佛教在中国从此走上了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不退转之路。宋孝宗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知识分子也清醒地看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氏”。宋、元、明、清四朝,直至西元1898年,中国佛教始终处于“融合阶段”。在清代盛世的空前广大的版图上和空前众多的人口中,佛教的踪影几乎处处可见。

“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佛教在这 900 年间空前广泛地深入地与中国的文化全面结合，特别是借助于诗词、剧作、小说等文学形式和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成，成为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整个民族心理、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的有机成分。佛教在中国已发展到人们觉察不到而实际上它却客观存在着，所谓“日用而不知”、“大而化之”的地步。

之所以能发展到这一步，佛教与儒道的融合是其关键。“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是彻底的具有中国封建时代特色的佛教，是中国佛教在封建时代达到的最高思想阶段。佛教为“三教合一”的“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并伴随“三教合一”思潮的成熟而使自己具备了在封建时代的最终的成熟的外在面貌和内在思想。首先，对“身心性命”之学，佛教具有思辩的特长，“心”、“性”之辩，是佛学的老话题。强调内心约束，同时不忽视客观监督。其次，成佛与成圣一样，都涉及“人性”的善恶，即如何对待善的可能性和恶的现实性。最后，对出世与处世的思辩，解决了宗教与宗法的根本冲突，甚至使二者相互弥合与补充。思想理论上的新的理解和诠释方式为佛教的民族化、世俗化提供了依据。宋、元、明、清四朝，高僧辈出，大多能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直至近代“念佛不忘爱国”、“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独特的民族个性，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封建时代的丧钟在“戊戌变法”前后已经敲响,中国社会开始迈上了新的台阶,古老的中国就要启动现代化的进程了。就像上一个千年之末曾度过一段几乎毁灭的劫难一样,中国佛教又遭遇到大革命时代的巨大冲击和动荡。“庙产兴学”,一道似乎有理的命令,使佛教险些失去立锥之地。由于中国佛教是在封建时代中成熟起来的,反封建的矛头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刚刚从旧岁月中拔出脚,尚未迈出新步伐的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如何适应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成为现代社会思想的有机成分,这是“戊戌变法”之前资产阶级改革派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的课题。世界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内,无一不经历过这一变革,只不过在不同国度中具体的解决方式和解决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正是这种尝试的反映。“戊戌变法”中慷慨献身的谭嗣同,其以佛教为主旨的重要著作《仁学》,正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宗教革命的明确宣言。

封建时代的结束,使儒教在“三教合一”中失去了主体地位。这原本是佛教思想独立发展的一次极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正像中国社会未能进入完全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样,佛教的时代变革也未能实现。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佛教的改革基本停顿。50年代之后,由于